

作者的話



執行一樁尚未完成的遺願

這本《文集》收入的文章，雖然雜七雜八的什麼都有點，不過所談的主要問題，對我來說，其實是在執行一樁遺願——我父親的遺願。

我父親紀登奎於1988年7月去世，至今已經18年了。因為患急性心梗，他去世得很突然，在臨終之前，其實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麼遺願；因此，是我自己把它當作父親的一樁遺願的。當然，也不是這些年來一直在全力以赴地做這件事；不過，這樁事卻始終縈繞在我的心頭，就是說，祇是一直在想著這件事，讀書、閱讀報刊、有時與人討論，都想著它。

說起來，這已經是將近20年前的事了。1986年底1987年初，春節放假，我回北京探親。那時我在山東省內燃機質量監督站工作，幹的是給企業發金牌、銀牌、合格證那些個事，一出差就是半月20天；因為在基層，又是業務工作，對社會上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事，消息很閉塞。回到北京，才聽到人們議論紛紛，說胡耀邦又出問題了，感到很吃驚。

父親自1980年辭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已經五、六年了，於1982年分配到「國務院農研中心」工作，事情也不多。因此，晚上也就和我們一起看看電視。

有一天晚上（我沒有核對日期，但記得很清楚，就是

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公佈胡耀邦犯錯誤和免去總書記職務的那個晚上），看完電視後，我隨父親到他的書房裡聽他聊天。那時我已經知道他的這個習慣：他並不是要對我講什麼，也不是要聽我講什麼，甚至也不管他的聽眾是否聽得懂，祇是他在想著什麼問題的時候，有個人在他的身邊聽著，似乎可以對他思考問題、理清思路有點幫助。

用語言來幫助整理思想，這樣的習慣對政治家，可能並不相宜；不過，有時候他也一個人默默地沉思；而他這時對所選擇的聽眾，似乎也專門找那些聽不懂的人來充當，我後來聽說，他原來的一位警衛員，就聽他說過不少。

父親開講了。一開始，他仿佛在自言自語：「噢，還是老辦法。原來以為，這一次也許會換個辦法，比如以健康原因什麼的……；還是老辦法，總要說個什麼錯誤才行，不是左了，就是右了，……這一回的名堂，題目是自由化」。

接著，他講到黨內對胡耀邦事件的一些反映：一位文藝界的領導人（當時他說了名字，可是我忘了），吃驚得很，說：「一覺醒來，唉呀，仿佛天都變了，好像又回到1957年反右派的時候了。聽廣播裡的那些話，『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連語言都是一樣的」。

父親評論道：「此人在文藝界的領導人裡，還是個『延安派』呢。你看，連他都是就這麼個感覺。」父親接著說：他問我形勢會怎麼發展，我對他說，作為朋友，我勸你一句，這種情況下，你還是不要出風頭的好；最好也不要呆在北京，到外地去，躲幾個月。目前這種局面，恐怕連半年也很難維持。

說完「他的朋友」的事，父親又說：「那些個話，老人們聽著，都熟悉得很，還是他（父親這時沒有說誰，不過我想他大概是說鄧小平同志）抗日戰爭時期的那些個說法，

『依靠進步力量，團結中間力量，打擊頑固勢力』……，還是對付張蔭梧那些磨擦專家的一套辦法。他腦子裡印象深的，還是那個時代的一些思想，所以到了關鍵時候，一著急，看家本事就拿出來了」。

——父親說的「那些個話」，可能是指當時報刊上的什麼文章裡的話吧，我沒看過，後來也沒查過。不過抗日戰爭時期，我父親是「冀魯豫」的幹部，鄧小平同志是「晉冀魯豫中央局」的書記，我父親所在的那塊根據地，是鄧小平同志領導的，所以父親對小平那個時候的政策思想，大概比較熟悉。

父親那時已經下臺五、六年了，大概是「無官一身輕」吧，所以這時說話的口氣，像個「觀潮派」似的：

我倒要看看，這一回這個「反自由化」，他們可該怎麼個反法嘛；農村改革，到1982年底，八億農民已經都自由了呀……。

大概因為在「農研」工作吧，他又說到杜潤生：杜潤生現在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總參謀長啊，外國學者到中國瞭解農村改革，找到杜潤生，就算到頂了，杜潤生現在是世界名人了。可是，這個杜潤生搞農業，和毛澤東搞農業是一個搞法，（他看出我聽不懂，解釋說）毛澤東搞農業，就是不搞生產力、也不搞上層建築，兩頭都不搞，祇搞中間的一個生產關係，現在杜潤生搞農村改革，還是這麼個搞法。杜潤生到下面作報告，不要稿子，一講就是幾個小時，「商品化」、「專業化」、「家庭承包」、「雙層經營」……，情況很熟悉，很有思想，口才也好；缺點是，講農村改革，關於上層建築領域的問題，農村地區黨的建設、政權建設、文化建設……，這些方面的問題怎麼搞，他沒有講過，關心和

研究也不夠。農研開會，有人批評農業投資太少，杜潤生怎麼給大家解釋呢？（父親一邊說一邊笑）他說，國家計委歷來是工業計委，我們要求給農業增加點投資，人家不給嘛，咱們爭也爭不過人家，我看，咱們農研的工作，就給農民爭點自由吧。……這話倒不假，八億農民的自由，杜潤生倒是真的給爭來了。

父親在「農研」工作時，還承擔過分配給他的一個任務：東歐國家關於「僱工」問題的政策、法規彙編。他利用過去的老關係，讓我們國家駐東歐各國使館幫助搞的材料，他親自整理編輯。他在「農研」當了幾年「研究員」，這也算是他完成的一項「研究課題」吧。

在「農研」工作時，他也到基層搞過一些調查。談到下去調查的情況，好像是貴州吧，他說：省政協幾位「三大改造」之前的老工商業者，就是舊社會的老資本家，到基層視察，在幾個私人企業看了情況、聽了彙報以後說，這些企業現在的這一套做法，和我們過去辦企業的方法，沒有任何區別，完全一樣嘛。

他還講了一個有趣的事，可能在《大參考》裡看到的吧，是外國人對中國「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映：上海一家外資企業的一位美國老闆，聽到我們「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感到很理解，兩手一攤，說：「你們中國人真奇怪，一方面反對自由化，一方面又要引進外資，把我們這些人請進來；我們來這兒是幹什麼的？我們這些人到這兒來，就是專門來搞自由化的嘛！……」。

說到胡耀邦，他說：耀邦這個政治家，是個浪漫主義政治家，話說的太多、太隨便，三天一個講話，五天一個講話，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言多必失啊……。耀邦政治上還是不錯的，他應該多管點政治上的事，多管管黨；經濟上的事他不大懂，可他偏偏特別喜歡對經濟方面的問題表態，什

麼「有水快流」啦，「增百致富」啦，講的很淺、也很不認真；還有這個工程、那個項目，亂批條子，到處許願……；他講完以後，下面就打著總書記的旗號，來向國務院要錢，搞的國務院很難辦，紫陽當總理，自然對他有意見……。

父親說：不過，現在中央的情況，和毛澤東的時候也不一樣了，胡耀邦是總書記了，可他講了個「增百致富」，全國各地，一半聽，一半不聽。薄一波說：「我聽到書記處吵架，很放心；祇要書記處吵架、拍桌子，中國就出不了大亂子。」父親說，薄一波這個話講得有點道理，就怕上面一號召，下面大轟隆，中央鴉雀無聲，一點不同意見也沒有，那就該出「五八年」、「文化革命」那樣的事了。中央有一點不同意見，有什麼了不起嘛，沒有壞處的。

父親說：耀邦喜歡在下面跑，一天能跑十幾個縣，坐個直昇飛機。陳雲批評他：你這麼個跑法，肯定要垮臺。陳雲有些話講得很好，比如不唯上，不唯書，祇唯實；可是這個「實」，到底是個什麼情況，你坐在家裡怎麼能夠知道嘛？所以，陳雲對改革的態度，實際上有個認識論的問題。身體不行了，下不去了，許多情況就不瞭解了。耀邦願意多接觸基層，能聽到工人農民和基層幹部的聲音，可以少犯錯誤，這一條總是好的。

說到胡耀邦出問題，父親說：這個事情，半年前已經很清楚了。去年（1986年）夏天北戴河會議討論政治改革以後，趙紫陽當了「政治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這種人事安排就很奇怪；原來，中央「經濟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就是趙紫陽；現在，中央「政治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還是趙紫陽；那麼，胡耀邦這個總書記幹什麼事呢？後來，「13大」的人事問題小組裡，也沒有胡耀邦，這就更奇怪了，胡耀邦這個總書記，一不叫他管政治，二不叫他管組織，還有什麼事情好管啊？他這個總書記不是要「失業」

了嗎？這種人事格局，顯然是一種非常安排，非常的人事安排，意味著政治上的非常情況。這就是說，中央要出事了。

他歎了口氣：這個中央的最高層，裡面的名堂特別多。每年過春節這個時候，都過不大安生，比較多事。這種情況，似乎歷來如此，毛澤東的時候，就是這樣；文化革命的時候，頭一年是「二月提綱」，第二年「二月逆流」，再過一年是「楊、余、付事件」，也是春節以後……，這一回的事，又是春節。原來以為，總會等到開「13大」時再解決吧，現在提前了……。

關於北戴河會議的情況，不知道他從哪裡聽來的，父親說，去年夏天北戴河會議的時候，小平找常委的幾個人談話，說：「廢除終身制，是我提出來的，我下，怎麼樣啊，你們議一下。」耀邦馬上說：「好！我擁護。小平同志帶頭廢除終身制，這個舉動，在中國歷史幾千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幾百年，都是一個創舉。歷史將為小平同志這個創舉樹立一個偉大的紀念碑。小平同志帶頭下，我也下。」接下去，冷場了。趙紫陽說了：「現在馬上下，恐怕還不行吧，小平同志還得再搞一段吧。」會後，就有人去小平同志那裡告狀，說耀邦有野心啦，等等。父親下面的話，好像是他的評論：「你看，擁護就是反對，反對就是擁護，事情就是這樣。你擁護，是擁護人家下臺嘛」。

父親又說到中央的一些人事情況，主要是胡耀邦免職以後總書記的人選。我哪裡知道那些隱晦曲折的事。父親祇是自顧自地說，有的大概是他聽到的一些信息和議論，有的可能是他的評論，我分不清、也記不住。

薄一波是父親的老上級，可他似乎對薄一波有意見：薄一波，薄老啊，都80多了，還想怎麼樣呢？……前些時候，他捎信叫我去一趟，我沒有去。我不去，這種時候，中央的大人物，一個也不見。

趙紫陽是他的老戰友，他們相識很早，年輕的時候就在一起，一直關係很好。可他對紫陽也有意見：這個紫陽也真是的，關鍵時候，粘粘糊糊，是個粘窩窩；中央這一次的事，他的話雖然說得很婉轉，但態度還是清楚的，這件事，他將來怎麼向歷史作交待嘛。他要是不接這個總書記職務，就給小平出難題了，小平怎麼辦呢？他就不好辦了……。

——我聽父親的老戰友說過：你父親這個人過去就是這樣，年輕氣盛，鋒芒畢露，臧否人物，不管不顧的。看來，老戰友說他的這個毛病，所言不虛。父親自己也曾說過，他下臺的時候，小平同志和他談話，說的也是：「登奎同志啊，你的缺點，就是太鋒芒畢露了；我呢，我的毛病，也是鋒芒畢露」。

他當時說的話，我記得的，還有這麼幾句：楊尚昆，是當過北方局書記的，有能力。……看來要搞成一個「老人政治」了，可是剛講了「廢除終身制」，怎麼給黨內交待呢？

離「13大」祇有七、八個月了，這「反自由化」剛開張，要轉彎子，再「反左」，沒有時間了嘛，「反右」這麼一直反下去，這個「13大」能開成個什麼樣子呢……？

父親又談到改革：改革開放這件事，小平是正確的。即使歷史出現曲折，改革遇到挫折，也不能說改革開放是錯的。對外開放，不管有多少問題，出多少洋相，還是應當開放，關起門來搞，總不是個辦法。學生們鬧事，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個斯大林模式。」這個話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斯大林搞的這個榜樣，帶了個不好的頭。毛主席可能並不喜歡那個「斯大林模式」，曾經講了個「十大關係」，那些話講得很好、都不錯，可是實際上，這「十大關係」，哪一個「關係」，他也沒有處理好。小平同志搞改革開放，這在歷史上是站得住腳的。

他又對小平同志發表評論：在黨的歷史上，小平在路

線問題上是不欠什麼賬的。毛澤東正確的時候，小平是跟毛澤東的。後來毛澤東搞錯的事，小平有點賬，也不多。文化革命被打倒了，人家自然沒有賬。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搞了個歷史決議，總的來說，處理得不錯，同蘇聯人對斯大林的問題相比，處理得要好的多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光是把斯大林罵了一通，對斯大林30年的歷史，不作一點分析，這不是個辦法。改革開放如果搞得好的，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也許會超過毛澤東。改革開放搞得越成功，毛澤東在社會上的影響還會小；什麼時候改革開放出問題了，遇到挫折了，人們就又想起毛澤東了。

父親又對「改革」進行評論：改革八年了，怎麼評價？我看，經濟上成績很大，政治上損失慘重。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不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不適應，於是，經濟基礎腐蝕上層建築，商品經濟這個經濟基礎，嚴重地腐蝕著我們這個黨。腐敗，從農村的大隊黨支部，一直搞到政治局委員的家裡去了……，前一段時間一些高幹子女出問題，就是這個原因。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如果把這個黨搞壞了，事情可就大了。

小平的想法，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加上「延安作風」和革命老傳統；這樣搞法，恐怕不行，起碼是不夠的。……他又說到了列寧：列寧的說法，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加電氣化，再加國民教育，再加什麼來的……；就是說，把他認為的好東西都加在一起，事情就這麼簡單嗎？這種辦法，就能行嗎？

——父親對馬列的經典還是看過一些的，可他對列寧一些話似乎有點不以為然。毛主席剛去世的時候，他大概看過列寧臨終前的一些文章，記得那時父親說過：列寧在一篇關於工農檢察院的文章中說，為了防止黨中央發生分裂，要增加工農出身的中央委員。列寧的文章，我看了好幾遍，可我

還是想不明白，增加一些工農出身的中央委員，就能防止中央分裂嗎？為什麼？我看不出這個話有什麼道理。

父親說：對胡耀邦的事，人事方面的恩怨糾葛，祇是表層的因素；深一層看，是因為改革，如果和改革聯繫起來看，中央出這樣的事，恐怕不是偶然的。蘇聯出了個「葉利欽事件」（指當時戈爾巴喬夫批判葉利欽並撤銷他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中國出了個「胡耀邦事件」，為什麼搞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出這樣的事，這是偶然的嗎？改革過程中的這種政治現象，值得注意，應該好好想想。

父親一向很健談，已經三四個小時了，可父親卻似乎越談越來了精神，他又說到理論：要保證改革的成功，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要把理論問題解決好。現在理論上的提法，鄧小平的概括，叫「兩個基本點」，一個基本點，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搞活」。

父親的神態和語氣，仿佛坐在他面前的我，就是小平同志，要向「兩個基本點」的發明者慷慨直陳、面折廷爭：這個說法不行。你這「兩個基本點」，黨內的認識統一起來嘛！一部分人擁護這個「基本點」，另一部分人擁護那個「基本點」；擁護這個「基本點」的人，不贊成那個「基本點」，而擁護那個「基本點」的人，又不贊成這個「基本點」……。

這種「兩個基本點」的理論，看來恐怕不行，不能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在實踐中，兩個基本點老是打架。雖然中央一再強調兩個基本點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但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兩個基本點仍然在打架。這個「兩個基本點」的理論，是個打架的理論，是個「二元的理論」，就是說，是個「分裂的理論」。理論上搞不好，不是小問題。理論上的分裂，會產生政治上的分裂；而政治上的分裂，還會導致組織上的分裂。這「兩個基本點」，在理論上自己和自

己打架，是自相矛盾的，在改革實踐中，會不斷產生激烈的衝突和磨擦……。

他的語氣似乎沉靜一些了，接著說：

對「胡耀邦事件」，更深一層看，問題就出在這「兩個基本點」的理論上。中國改革的實踐，在這「兩個基本點」的夾擊下，共產黨已經犧牲了一個總書記，胡耀邦；中國改革如果不把理論上的問題解決好，以後還會有人要犧牲在這「兩個基本點」的磨擦和夾擊之下。胡耀邦這個總書記，工作難搞啊，他搞的，是一種「夾擊中的奮鬥」。中國改革如果不把理論上的問題解決好，「胡耀邦事件」還會重演的……。

我全神貫注地聽著，在震驚之餘，插了一句：改革是否一定要把理論搞清楚，列寧不是說過，布爾什維克黨在反對沙皇的時候，要麻痹大資產階級，在反對大資產階級的時候，要麻痹小資產階級……。

父親接口便說：理論必須有說服力，才能站得住腳，才能使全黨的思想統一起來。你說的那個「麻痹」的辦法，恐怕不行。我們這個國家，就有那麼一大批人：黨校、馬列學院、政研室、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你養活了那麼一大批人，他們這些人，就是吃這碗飯的，他們的工作，就是專門要把這些事情搞清楚的。對這些人，你必須給他們一個明白的說法。不然，你叫這些人整天幹什麼呢？像你說的，「麻痹」他們？那算是個什麼辦法！

後來我想，父親不同意列寧的話，也許是古人講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道理，革命的道理和治國的道理，是不一樣的。可在當時，我卻感到十分茫然，半晌沒吭氣，而後，一臉疑惑地問道：那該怎麼辦呢？

父親又接著說：多種經濟成份，六中全會決議上已經提了。過去是領導人個別講的，這次是寫在黨的決議上。不是你說的那個提法，「綜合經濟基礎論」，一個時候，針對性

不同，提法也不同，意思是一樣的。國家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三資企業、私人經濟，都有了。私人經濟就是民族資本嘛，允許外國資本進到中國來，順理成章，也就應該允許民族資本在自己的國家有一席之地。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點積極作用嘛，不一定要把資本主義搞得那麼乾淨，五種經濟成份共存嘛。

中國革命，是毛主席提出「新民主主義論」以後，理論和政治路線才真正解決了。那一段時間，我們黨幹得很好，這是實踐已經證明了的。後來，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把多種經濟成份搞掉了，出了許多毛病，搞的不好。

現在講「堅持毛澤東思想」，可是，什麼是「毛澤東思想」？現在的說法是，凡是正確的東西，哪怕別人的思想，祇要是對的，就都是「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的思想，祇要不對，就不能算在裡頭。這個說法，恐怕不行。毛澤東思想，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嘛。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應當堅持前一個階段經過實踐檢驗的那些正確的毛澤東思想嘛，後來那個錯誤的毛澤東思想，我們為什麼還要堅持呢？

比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你能說它不是毛澤東思想？如果我們今天還要堅持的話，是不是還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呢？還有，如果認為「三大改造」還要繼續堅持的話，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後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經濟成份，現在對這些東西怎麼辦？再搞一次「三大改造」，把它們消滅嗎？

父親還講起他在農研工作時的一件事：有一年的關於農村「一號文」裡，關於允許黨員僱工問題，好像是萬里提出來的；陳雲堅決不同意，如果不刪掉，文件他就不批發。這個問題，大家自然都很關心小平同志是個什麼態度，後來，杜潤生傳達小平同志的批示，意思是：對黨員僱工，堅決反對，不能允許。但是，又明確交待，鄧小平的這個批示，不准向下傳

達，存檔。當時，人們聽了以後，很吃驚，都愣住了。

我問，寫了批示，又不准傳達，這是為什麼呢？父親說，不准傳達，是小平同志怕傳達下去以後，影響下面致富的積極性。我問，那他又為什麼要寫這麼個批示呢？父親說，小平同志會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畢竟是一個大國的共產黨領袖，如果將來這樁事出了問題，不要說他沒有講過話啊，白紙黑字，有言在先，存了檔的，不要說他沒有明確態度。

已經凌晨三點了，父親有點倦意了，他似乎有點漫不經心地說：

改革的理論問題，說起來也不難解決。就是少奇說的那個辦法，把新民主主義的階段再延長一個時期嘛……。

從晚上九點到凌晨三點，父親滔滔不絕地講了六個小時。那個晚上他談的，自然比這還要多，不過我能記起來的，就是這些。

1987年冬，我出差路過北京回家，「13大」已經開過了。父親似乎還在想著他那個事，他又說起「理論問題」，不過主要是介紹情況：

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也像社會上那些玩世不恭的議論一樣，拿它「開涮」：社會上流傳的話，初級階段是個筐，什麼東西都往裡裝……。不過對這個嚴肅的話題，下面的話還很「正經」，他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趙紫陽提出來的，小平很讚賞，中央討論時，大家也都贊成，說：我們不要像蘇聯人那樣老是吹牛，先說「向共產主義過渡」，又說「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現在又要往後退；我們就說個「初級階段」吧；退一步，回到「初級社」去，對，

我們搞個「初級社」就行了。——聽父親的口氣，這些話好像是政治局會議上說的，不知他從什麼渠道聽來的，可能是李先念告訴他的吧。

他說：「兩個基本點」，前面又加了「一個中心」，變成「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了，作為「黨的基本路線」。這也是趙紫陽提出來的，小平對這個補充後的「提法」，十分滿意。

他還談到「13大」前的「形勢」：「5.13」一篇講話，就把「反自由化」的勢頭扳回來了，保證了「13大」有一條改革的路線，紫陽幹得不錯。——半年前關於趙紫陽是個「粘窩窩」的話，他也許覺得有點不妥，這一段話，似乎對他的老戰友的印象有了改變。

1988年5月，又是出差來京，在家裡見到父親老戰友的子女來看望，聽說她在部隊搞政工，父親就拉住人家討論「什麼是社會主義？」，大概他是想瞭解部隊對政治教育的反映吧。其實那丫頭稀裡糊塗的，可父親卻很認真。在家人看來，這也見怪不怪了，有時候，他甚至會很認真地和家裡祇有十五、六歲的小保姆討論農業的「價格政策」，向她詢問農村的糧食和農產品的價格。作為父親，他在家裡歷來沒有多少「爹道尊嚴」，所以我妹妹經常掛在嘴上的一句口頭禪便是：「爸爸真好玩兒！」

兩個月以後，父親突然去世了。他才65歲，體力還那麼健旺、精力還那麼充沛、思想還那麼有活力，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們唯一可以安慰的，是他的去世還不怎麼痛苦。

因此，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聽他說的最後的話，是關於他的老戰友趙紫陽：「這幾年搞經濟改革，紫陽學經濟很用功，辦法也很聰明，叫僱人讀書，知道手下的青年人裡，誰讀過什麼書，什麼亞當·斯密，什麼社會市場經

濟理論，什麼凱恩斯、弗里德曼……，出差的時候帶著，坐火車、坐飛機，有點空閒，就聽人家講課，日積月累，慢慢就懂得不少了。紫陽學經濟，學得很有成績，現在很不簡單了……」。

關於趙紫陽的這些情況，我不知道父親是從哪裡聽來的，不過我感覺，父親對他這位老戰友，可能有點羨慕，而且覺得自己趕不上他的老戰友了；父親也在學經濟，有一次看到我的一套企業管理的書，很感興趣，還叫我給他買一套；在他桌子上，我看到放著本《資本論》，可好幾個月了，打開的還祇有幾十頁，可能對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讀起來很吃力吧。僱人讀書，父親過去也用過這個辦法，50年代搞工業的時候，他就在廠裡找幾個工程師，天天晚上給他上課，數學、物理、化學、機械工藝、企業管理……，如今下臺了，沒有權力和地位了，自然也沒有採用這種辦法的條件了，所以，父親可能對他的老戰友有點羨慕。

我觀察，父親對他這位老戰友，似乎有點競爭的心理。父親最後說的一句話是：「……不過，政治上搞大的局面，紫陽他不行。」

這句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不知道父親為何對他這位老戰友有這樣的印象，不過關於趙紫陽，他曾經講過這樣一件事：文化革命的時候，趙紫陽是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66年下半年，紅衛兵、造反派，鬧得天翻地覆，一撥一撥，沒完沒了，到年底的時候，大概搞得實在應付不下來、頂不住了。趙紫陽就對省委班子說：你們看這個形勢，我們無論怎麼檢討，恐怕也是過不了關的；人家根本不聽我們檢討，這些人就是要奪權嘛！這種局面，你們說怎麼辦？我看，我們乾脆把權交給他們算了。於是，就把省委的大印，那一堆木頭疙瘩，都交給造反派了。中央知道以後，很生氣，周總理坐飛機專程到廣東，把趙紫陽狠狠批評了一頓：

你當省委書記，是中央授的權；不經中央批准，誰叫你把權力交給他們的？！——父親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聽了祇是覺得好玩兒，那些高級幹部的規矩，根本不懂得；後來我想，作為相知很深的老戰友，父親也許是認為，紫陽的缺點是，面對複雜與困難的局面時，在必要的原則問題，尤其是這些原則在實際中互相矛盾的情況下，將這些複雜的原則堅持下去的意志力不夠堅強吧。

後來，我在尼克松寫於1988年的《1999：不戰而勝》的書中讀到他對趙紫陽的評論：

趙始終熱情地擁護鄧的改革，……許多反改革的強硬分子已不再干擾，但仍有一些人認為鄧的改革步伐太快。在趙能完全鞏固其權力之前，他將繼續求助於鄧調解他與保守派的爭執。一個尚未有答案的問題是，在鄧最終離開舞臺後，究竟誰有代替鄧小平的實力和遠見卓識。在共產主義國家，領袖祇能有一個。趙是否成為這個領袖，取決於他能否在他已展示的經濟策略家的才能之上，再成功地表現出政治策略家的技巧。

我想，對上面這段話的評論，如果我說趙紫陽辜負了尼克松的期望，有人也許會產生一些誤解，認為我仿佛是說趙紫陽是在策應尼克松的「和平演變」似的；所以我不妨這樣說吧，父親對他這位老戰友的看法，和尼克松對趙紫陽的看法，頗有些相似。對趙紫陽，父親竟然和一個曾經是美帝國主義的頭子的人看法相似！這使我感到愕然。我實在想不出事情何以竟會如此巧合的理由，我想，父親和尼克松，唯一相同的一點，是他們在各自的國家，都是「犯錯誤下臺的幹部」吧。

父親去世後，我調回北京。在精神的傷痛中，對父親談過的話，幾乎忘光了。可剛辦完調動手續，就趕上

「6.4」。父親沒有看到那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風波，他去世已經快一年了。

可能是由於那場政治風波的刺激吧，兩年多前那天晚上父親的談話，在我頭腦的記憶裡又被「激活」了。一段時間裡，有這樣一個念頭，儘管我知道它可能有點片面，可是卻像鬼魂附體一樣纏繞在我的頭腦裡——

在「兩個基本點」的夾擊下，共產黨果然又犧牲了一位總書記！

對「新民主主義」的關注，我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當然，在單位，也還有「研究課題」什麼的，可我的心思，卻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我歷來還喜歡讀書，而且閱讀興趣很雜，現在有了關注的焦點，於是，說得斯文一點吧，「上窮碧落下黃泉」，不管讀什麼書，都自覺不自覺地和這個問題聯繫起來了。「新民主主義」，成了父親留給我的一個特殊的「研究課題」，我說的我在執行父親的一樁遺願，就是這個意思。

1990年春夏的一段時間，我集中地思考過同中國改革有關的一些問題，也包括這個「新民主主義」問題。曾經將思考的問題寫下一些文字，湊成25條，有近十萬字吧。寫完以後，自然無處發表，也沒有打算發表，祇是寫給自己的，主要是想在那場政治風波的強烈刺激之後，清理一下自己被激情煩擾的紛亂思緒。除了給幾個朋友看過，就一直放在那裡。

在這本《文集》裡，將最後一部分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考——「第25條」——收入。這是十幾年以前寫的東西了，有些思想和文字，連我自己看著也不大順眼，作為自己對這個問題思考歷程的反映，算個紀念吧。不過，這個「25條」確實是那個時候寫的，有手稿為證。

毛澤東同志當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把它當作「社會性質」和「國體」來寫的，所以涉及的問題極為廣泛，可以說是包羅萬象。有一段時間，我怎麼也搞不明白：這個「所有制」是個什麼樣的問題？我總感覺這個「所有制問題」也該有一套理論規範的。到處搜尋檢索的結果，我終於找到了，原來它就是民法理論！使我有點驚訝的是，它不僅是一門淵博精深、規模宏大的大學問，而且這個民法的歷史如此悠久，竟然同孔夫子的年齡差不多了，它就是源於二千多年前古代羅馬時的「羅馬法」。

歪打正著，卻收穫頗豐，可這樣一來，一段時間裡我的學習和思考又搞到民法學裡去了。曾經對民法問題寫過兩本書，《商品社會的世界性法律》和《產權與法》，也祇是在民法的周邊有所涉獵而已。不過說起來，這兩本書，應該說是我對「新民主主義」的思考的副產品。幾篇有關民法的文字，收入這本《文集》，算是「撿草打兔子」的收穫吧。

幾年以後，我對「新民主主義」的思考有了一些新的心得：毛澤東同志創立的「新民主主義論」，不僅是在實踐中獲得成功的「革命理論」，而且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憲法基礎和憲政理論構架，也完全可以適應。

看來，中國革命的漫長歷史，並不像人們想的那麼簡單，其思想內涵是很豐富的。當然，與人類智慧創造的全部文明成果相比，革命時代的理論祇是它的一部分，而且應當說還是比較單薄的。我想，在中國為改革與現代化的努力而探索時，如果可以從我們黨自己的歷史傳統中找到現在和未來所需要的東西，我們無疑應當十分珍惜，努力把它發掘出來，並從現代的角度作出新的闡釋，在這個基礎上，用當今時新的話來說，再進行「創新」。

即以「新民主主義」來說，也被毛澤東稱為「國體」之論，既然在我們黨的歷史傳統裡原來就有，如果能夠符合與

適應我們國家現在和未來的需要，又何必捨近求遠，到外國人那裡去尋找與追求什麼「全盤西化」的名號？毛澤東晚年搞的「文化大革命」，捅了很大的亂子，也得罪了很多人，就他和黨內的高級幹部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友誼與情分而言，幾乎損失殆盡了。可是，毛澤東同志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有一些東西也很寶貴，比如這「新民主主義論」。

我對「新民主主義」的思考，到如今已經快20年了。我深深感到：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了，或許還需要20多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改革還來日方長，奮鬥正未有窮期。作為中國改革的總體把握，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具有「綱舉目張」的地位，必須處理好。

解決之途，不須捨近求遠，而是近在眼前，從我們黨歷史經驗的思想遺產中，就能夠找到可以繼承的東西。我思考的一些心得，概括說來，如果借用一句中國的老話，叫做「退一步海闊天空」：

黨的理論，回到「新民主主義論」；

黨的路線，回到「七大」；

憲政理論，回到《共同綱領》。

對於保證改革成功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這是中國的特殊優勢。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考，我所想到的主要內容，在我的「十屆人大立法座談會」的發言裡。當然，當時在會上祇是談了個題目和梗概，會後，全國人大辦公廳秘書處的同志向我要稿子，後來修改補充的。這篇東西儘管還很不成熟，不過我能想到的方方面面，基本都寫了。在這本《文集》裡，算是點睛之作吧，起碼篇幅還夠數，有十萬字。

很長時間裡，生活在「兩個基本點」鋪天蓋地的輿論

氛圍裡，老實說，對「新民主主義」的思考，我時常感到相當的孤獨和寂寞。況且，好歹我也是個黨員，還得守著「在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絕對一致」的規矩。後來，在主要是黨史研究的著作裡，我看到一些關於「新民主主義」的介紹論述，有文章，也有專著。這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和寂寞了，可是這些著作，還都是對歷史的敘述和評論，沒有將過去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同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聯繫起來。看來，在「與黨中央保持絕對一致」方面，這些論著的作者，起碼在思想上，比我的「黨性」要強。

也許是蒼天不肯負我吧，也可能得益於閱讀興趣很雜的緣故，我對「新民主主義」的思考，偶然的機會，在汪東興同志的回憶錄中，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可我有點不大明白：此書名為《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為何載入毛澤東同志關於「新民主主義」的一段談話？不過這倒正是我所關心的，那是毛澤東同志於1965年的8月5日同外賓的一段談話：

《新民主主義論》是1940年寫的。我參加共產黨，打了13年仗，在這13年之前還有六年，一共19年的時間，才認識到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要採取什麼政治綱領、文化綱領。花了19年的時間，你看，多困難！認識客觀事物是多麼困難。

應當說，這段話給我們的感覺有點奇怪：1965年8月，中國那個時候，早已從「新民主主義社會」經過「社會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可是在毛澤東這段談話裡，對他領導下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並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似乎並沒有表現出什麼得意與驕傲；那個時候，離他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時間祇有一年，毛主席的胸中也許已經在醞釀著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吧，

可是對他即將發動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與深入」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沒有表現出充滿自信的豪情。在這段談話裡，對他建國以後的這些「豐功偉業」，毛澤東連提都沒有提，卻在那裡懷念他的《新民主主義論》。

看來，毛澤東回到哲學了，他不是作詩，而是在講認識論，這個時候，詩人的激情看不到了，他的思緒冷靜、平和、理性、深沉。也許在毛澤東看來，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領袖，他在政治理論方面的思想創造，祇有《新民主主義論》，是真正靠得住的。

因為，當毛澤東說「認識到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的時候，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不會不知道這句話具有的分量；所以，對當年《新民主主義論》中論述過的中國「要採取什麼政治綱領、文化綱領」，他還是有點把握的。——起碼比他即將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要有把握的多，否則的話，他也不會在文革前夕給江青的信中，似乎面臨著一種莫測的兇險，竟然預兆不祥地說什麼要準備和馬克思和列寧一起「被打的粉碎」那樣的話了。

說起來，當年毛主席的著作印了那麼多，對「新民主主義」，知道的人還是不不少的。不過，如今人們說起「新民主主義」來，首先是覺得那都是些「歷史舊賬」和「老皇曆」了，而且許多人印象比較深的，大都是解放初期毛澤東批評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話。因此，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知識產權」，似乎從此以後，就由毛澤東轉讓給劉少奇了。就連我前面介紹的父親那個晚上的談話，說到「新民主主義」時，他提到的，也是劉少奇。看來，這「新民主主義」的「知識產權」，真的已經轉到少奇同志的名下了。

不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畢竟是毛澤東創立的，而且像他上面那段談話裡講的，「花了19年的時間，你

看，多困難！認識客觀事物是多麼困難。」我們看到，毛主席這段話，說得如此樸實平易，並不難懂；而且他老人家去世已經30多年了，可是到了今天，我們能夠確實地知道，在說這段話的時候，毛澤東的心裡是怎麼想的嗎？

「毛主席是人，不是神。」這句話如今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口頭禪了。毫無疑問，毛主席確實不是神，否則他也不會死；可是，他老人家的思想，像他用兵一樣，卻真的有點「神」。所以直到今天，到毛澤東的心靈深處探秘，仍然是一件有著無窮魅力的事情；看來，要認識究竟什麼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恐怕我們同樣會感歎：「你看，多困難！認識毛主席是多麼困難。」

實際上，和認識毛主席同樣困難的，而且和認識毛主席有密切關聯的，是認識我們的黨和國家的歷史，這當然主要指的是「毛澤東時代」。如今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黨中央已經作了結論。可是，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那場「文化大革命」呢？他老人家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麼呢？在今後的很長時間裡，恐怕我們還會有不少未解的謎團。

即如我們這裡談的「新民主主義」吧，迄今為止，我的思考，祇是認清了它適合中國改革在憲政方面的要求。不過，有一個問題仍然難免使人迷惑：「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無疑是毛澤東同志創立的，即使是「黨的集體智慧」吧，毛澤東在中共領袖中也比任何人都付出了更多的智慧和心血。可是，在解放初期，他為何匆匆忙忙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把剛開了個頭的「新民主主義」消滅呢？毛主席當年費了那麼多心血，難道他就不珍惜自己思想創造和革命實踐的成果嗎？難道毛澤東就不知道，他後來講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有那個時代經常掛在嘴上的「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道理，若說在中國

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卻是「社會主義」取代了他自己在理論和實踐上創立的「新民主主義」嗎？

——說起來，倒是毛澤東當年創立「新民主主義」時政治上的老對手王明，卻始終沒有忘記這件事，並且仍然耿耿於懷；30多年過去了，中國已經糾纏在「文化革命」的漩渦裡，人們大都已經把這段「老皇曆」忘記了，但是王明於1973年在蘇聯寫文章，攻擊毛澤東的主要話題，還是「新民主主義」。

到了1965年8月，「社會主義」取代「新民主主義」，早已經「生米做成熟飯」了，毛主席卻又頗為深情地唸叨起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來；但是，不到一年以後，他就發動了稱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那麼，他老人家上面這一番話，僅僅是懷舊嗎？可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歷來是「厚今薄古派」，當張奚若批評他「藐視古董，迷信未來」時，他坦然承認，毫無慚色，反以為榮。難道他老人家真的是因為年紀太大，有點老人心態了嗎？不過從他暢游長江展示的萬丈雄心來看，又不大像。

對「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實踐歷程，我們的黨史，目前基本上還是以陳述歷史事實並依當年的「宣傳口徑」來作解釋。可是，精心編制的所謂「宣傳口徑」，就是領袖們真正的決策動因嗎？要知道，我們黨是很會「造輿論」和「搞宣傳」的。領袖們的決策動因，又是基於什麼樣的歷史背景和客觀情勢呢？諸如此類，還有許多問題尚待進一步的探索和思考，才能得出有說服力的解釋。

因此，對「新民主主義」這個「研究課題」，儘管我的思考也有一些心得與收穫，但頭腦裡還有不少疑惑得不到解答。所以我說，我執行的這樁「遺願」，還「尚未完成」，需要繼續去搜尋檢索、思考探求。